

产权认知、行为能力与农地流转签约行为

——基于全国 890 个农户的抽样调查

刘一明, 罗必良, 郑燕丽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 运用 Logistic 模型对全国 890 个样本农户的调查结果进行实证分析, 揭示农户的农地产权认知、行为能力、禀赋特征及农地流转特征对签约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 农户对农地排他权的认知、农户的交易能力、非农就业及农地流转的对象与方式会对农户的签约行为产生影响。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法律上赋予农户稳定的地权; 从法律上进一步界定农户对土地的产权, 并对其他群体的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 加强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宣传与解释, 帮助农户更好地理解国家法律和政策来保护自身的权益; 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来促进农地流转的契约化和规范化, 进而保障务工农民的权益。

关键词 土地制度; 农地流转; 产权认知; 行为能力; 签约行为

中图分类号: F 30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3)05-0023-06

随着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与发展, 我国农地使用权市场已初步形成^[1]。本课题组 2011 年的全国农户抽样问卷表明, 已经有 28.43% 的农户参与农地流转, 发生流转的农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22.00%。与之伴随的是农地流转纠纷发生率偏高, 农民权益受损情况屡见不鲜^[2]。李小云等对全国 6 个省的调查发现, 28.40% 的农民认为权益受损, 其中土地权益受损是一个较突出的问题^[3]。农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已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4-8]。

早期的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亲缘和地缘特征, 农地的流转主要发生在亲友邻居或本村农户之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 农地流转对象趋于多样化, 农地流转双方的亲缘或地缘关系不再紧密, 且随着农地流转管理的规范化和农户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的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开始通过签订合同来保护其权益^[9]。叶剑平等对全国 17 省份的调查发现 34.1% 的农户签订了合约, 且土地产权越清晰签订合约的比例越高^[1]。合约的实质是签约方之间权利的重新分配^[10]。当不同所有者将其资源联合起来进行生产时, 就必须通过合约部分地或完全地转让其拥有的资源的产权, 通过谈判并缔结

合约条款来规定参与者之间利用资源的方式及分享“合作剩余”^[11]。农民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签订合约有助于农地流转的契约化, 从而有助于提高农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保护农民的权益。农户拥有的农地的产权特征会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意愿和行为产生影响^[12-14], 进而对其缔结合约的意愿和选择产生影响^[1]。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农地流转交易对象的变化角度来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时签约行为的变化, 并关注到了地权的稳定性对农地流转和合约选择的影响, 但没有从微观层面进一步解释不同农户的选择行为。

除了农地的产权特征会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行为及其签约行为产生影响外, 另一个事实同样值得关注。即由于农户仅拥有农地的承包经营权且该项权利是由政府赋予的, 而非通过市场交易获得, 因此农户对其拥有的农地的产权的认知及其行为能力同样会影响农户利用农地或参与农地流转的预期, 进而影响其签约行为。因此, 本文将基于农户对农地产权的认知及其行为能力的调查, 探讨农户的产权认知及其行为能力对农地流转签约行为的影响, 从而揭示哪些产权特征能激励农民签订合同; 哪些

收稿日期: 2013-07-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IRT1062); 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前我国农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护研究”(09JZD0022)。

作者简介: 刘一明(1970-), 女,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资源经济、制度经济、农业经济。

通讯作者: 罗必良(1962-), 男, 教授、长江学者; 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与制度经济。

产权特征起到了反向抑制作用。并尝试重塑农地产权,通过激励农户签订合约来促进农地流转的契约化和规范化,从而实现对农民权益的保护。

一、理论分析

目前对产权的分析主要是从产权本身的特性角度来分析产权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认为当产权具备排他性、可转让性和可强制执行性时,资源将得到有效配置^[15]。通常讨论的产权特性是指通过法律赋权或合约的方式界定产权主体拥有哪些权利或特权,以及受到哪些约束。这种分析方式隐含的假设是社会与个人是同质的,即不同区域范围的不同社会群体对法律赋权的认知是同质的,且不同的个体行使产权的能力也是同质的,因而不考虑产权主体和社会其他群体对法律赋权的认同和个体行为能力可能存在的差异,仅从产权本身的特性来分析产权的有效性以及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但事实上,由于个体间的差异、社会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存在及在区域上存在差异性,产权主体及社会其他群体对法律赋予的产权的认知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对产权主体的行为预期产生影响。而产权主体行使产权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其行为选择。

1. 农户的产权认知对签约行为的影响

农户对农地的产权认知是指农户对其拥有的农地的排他权、处置权和交易权的认知。本文将从两方面来考察农户的产权认知对农地流转签约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农户的产权认知与法律赋权的偏离对签约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农户的产权认知与社会认同的偏离对签约行为的影响。

农户对法律赋权的认知是在对法律赋权和社会认同的了解和理解及自身行为能力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农户的认知可能与法律赋权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另外,农户在形成自己的认知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农户对法律赋权不了解,仅基于自己的理解形成对法律赋权的认知,若这种认知与法律赋权偏离,不会对农户的预期产生影响;另一种情形是农户了解和理解法律赋权,但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从而形成自己的认知,若这种认知与法律赋权偏离,可能会对农户的预期产生影响。

社会认同是指不同社会群体对法律赋权的认同程度,社会认同可能会对产权当前的行使和未来的变化趋势产生影响,尤其是强制执行产权的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法律赋权的认可程度会对产权的可

强制执行性产生影响,即影响产权主体权益的安全性。若农户对产权的认知与社会认同偏离,农户也可能强化或弱化其产权,从而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意愿及签约行为产生影响。

若农户对农地产权的认知与法律赋权或社会认同一致,农户在流转农地的过程中具有相对稳定的预期,将倾向于签订合约来保护自身的权益;若农户对农地产权的认知与法律赋权或社会认同不一致,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预期将面临各种风险,农户的签约行为将取决于农地流转租金与各种风险带来的交易成本的权衡比较。在自愿缔约的情形下,若流转租金大于交易成本,农户可能会选择签订合约;若流转租金不足以弥补交易成本,农户则可能不愿意签订合约。

2. 农户的行为能力对签约行为的影响

农户的行为能力是指农户行使农地产权的排他能力、处置能力和交易能力。农户的行为能力不仅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预期,而且会影响农户对农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及其带来的交易成本的评估。若农户具有很强的行为能力,农户可能低估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农户的行为能力还会影响其参与农地流转的机会成本。行为能力强的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机会成本可能更高。因此,当农户面临签约决策时,将对其流转租金、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进行权衡比较。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1 年对全国 890 个农户的抽样问卷。样本情况及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对合约选择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转出户	转入户	总计
参与农地流转的样本数	207	64	271
签订合约的样本数	98	45	143
签约样本占比/%	47.34	70.31	52.77

注:在 271 个农户中,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样本为 253 个,其中有 18 个农户既有转出又有转入。

调查数据表明,890 份样本农户中参与土地流转的有 271 户,其中转出农地的有 207 户,转入农地的有 64 户,分别占总样本的 23.26%和 7.19%。从表中可看出:参与流转的农户中有超过一半的农户(52.77%)签订合约,其中,70.31%的转入户签订了

合约,而转出户为 47.34%。由于调查仅限于农户,样本中未包括其他转入农地的主体,因此本研究仅对转出农地的农户签约行为进行分析。

2. 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签约选择,“1”表示签订了合约,“0”表示没有签订合约。解释变量包括农户的产权认知与法律赋权的偏离(含 3 个指标)、农户的产权认知与社会认同的偏离(含 3 个指标)和农户

的行为能力(含 3 个指标)变量。由于农户的禀赋特征和流转的农地的特征也会对农户的签约行为产生影响,模型中还将考虑这 2 类变量。其中,农户禀赋特征包括人力资本(含 3 个指标)和社会资本(含 2 个指标)变量;农地的特征包括农地禀赋(含 1 个指标),流转对象(含 1 个指标)和流转方式(含 1 个指标)变量。模型中各影响因素选取的具体变量、变量的赋值及主要统计量详见表 2。

表 2 模型变量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指标	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是否签订合约	是=1;否=0	0.47	0.50
解释变量				
人力资本禀赋	非农就业人数所占比重	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家庭总人数	0.25	0.34
	非农职业的分布	普通打工者=1;企业管理人员=2;专业技术人员=3;行政干部=4	2.78	2.56
	家庭平均非农工资	家庭成员从事非农工作的工资的平均值	1 512.41	1 304.15
社会资本禀赋	是否三代人生活于本村	是=1;否=0	0.43	0.50
	是否认识村里权利大的人	是=1;否=0	0.32	0.47
农地特征	转出农地的灌溉条件	灌溉条件赋值:不好=1;一般=2;好=3,再用各地块占总面积比重×各地块灌溉条件赋值	2.87	1.07
	转给生产大户的农地数量	数量是指面积	0.23	1.04
	政府强制转出的农地数量		0.15	0.76
农户产权认知与法律赋权的偏离	排他权认知偏离度	农户的认知	-0.05	0.56
	处置权认知偏离度		0.05	0.57
	交易权认知的偏离度		0.00	0.51
农户产权认知与社会认同的偏离	排他权认知同的偏离度		0.07	0.47
	处置权认知的偏离度		0.06	0.47
	交易权认知的偏离度		0.09	0.55
行为能力	农户的排他能力		-0.03	0.70
	农户处置能力		0.08	0.61
	农户交易能力		0.77	0.53

所示。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1. 模型选择与估计结果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故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模型进行分析。其模型形式表示如下:

$$\ln \left[\frac{p(y=1)}{1-p} \right] = \beta_0 + \sum_{i=1}^k \beta_i x_i \tag{1}$$

即:

$$p(y=1/x_i) = \frac{\exp(\beta_0 + \sum_{i=1}^k \beta_i x_i)}{1 + \exp(\beta_0 + \sum_{i=1}^k \beta_i x_i)} \tag{2}$$

式(1)、式(2)中,y 是一个二分类虚拟变量,代表农户签约选择;x_i为 k 个影响农户签订合约选择的解释变量;β₀ 是该回归方程的常数项;β_i 为回归系数。

本研究使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对转出户的签约行为进行分析。估计结果如表 3

2. 计量结果分析

(1)农户的产权认知对签约行为的影响。“农户对农地排他权的认知与法律赋权的偏离度”对签订合约的影响程度较显著,在模型中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农户对农地排他权的认知与法律赋权的偏离度越大,农户在转出农地时越倾向于签订合约。如表 2 所示,农户对农地的排他权的认知与法律赋权的偏离度的均值为负,意味着农户弱化了其拥有的农地排他权,因而农户在转出农地时可能会低估农地流转中的风险成本,从而倾向于选择签约。

“农户对农地排他权的认知与社会认同的偏离度”对签约行为具有较显著的负向效应,说明农地排他权认知与社会认同的偏离度越大,转出户签订合

表 3 农户签约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

影响因素	B	Wald	Sig.	Exp(B)
农地排他权认知与法律的偏离度	1.046 * *	5.72	0.017	2.846
农地处置权认知与法律的偏离度	-0.161	0.157	0.692	0.851
农地交易权认知与法律的偏离度	0.587	1.563	0.211	1.798
农地排他权认知与社会认同的偏离度	-0.865 *	2.909	0.088	0.421
农地处置权认知与社会认同的偏离度	-0.158	0.108	0.742	0.853
农地交易权认知与社会认同的偏离度	0.18	0.152	0.696	1.197
农户排他能力	0.472	2.326	0.127	1.603
农户处置能力	-0.361	0.808	0.369	0.697
农户交易能力	1.572 * * *	10.529	0.001	4.817
家庭非农就业人数所占比重	-1.775 * * *	7.442	0.006	0.17
非农职业的分布	-0.229 * *	3.981	0.046	0.795
家庭平均非农工资	0.001 * * *	7.461	0.006	1.001
是否三代人生活于本村	0.807 *	3.776	0.052	2.241
是否熟知村里权利大的人	-0.535	1.356	0.244	0.586
转出农地的灌溉条件	-0.013	0.005	0.943	0.987
转给生产大户农地数量	1.355 * *	4.324	0.038	3.876
政府强制转出农地数量	0.790 * *	3.97	0.046	2.204
常量	-1.32	2.371	0.124	0.267
回归结果评价 Hosmer & Lemshow test		Chi-Square = 12.935 df = 8 Sig. = 0.114		
Omnibus Tests of Coefficients		Chi-Square = 70.616 df = 17 Sig. = 0.000		
-2 Log likelihood		163.546		
Cox & Snell R ²		0.340		
Nagelkerke R ²		0.455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约的可能性越小。如表 2 所示,农地排他权认知与社会认同的偏离度的均值为正,表明农户认为其拥有的农地排他权大于社会所认同的其拥有的农地排他权。由于本文测量的社会认同主要是指强制执行产权的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农户排他权的认知,这意味着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农地产权管理过程中可能会侵犯农户的排他权,导致农户对其拥有的地权稳定性预期不高从而高估农地流转中存在的风险成本。为了减少地权不稳定带来的不确定性,农户在流转其农地时可能不倾向于签订合约,从而减少地权变动可能带来的风险。

(2)农户的行为能力对签约行为的影响。行为能力变量中的农户交易能力对签订合约与否影响最显著,在模型中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正,说明农户拥有的农地的交易能力越强,其签订合约的可能性越大,而农户排他能力与处置能力对农户签订合约的影响不显著。由于农户交易能力与农地的流转行为密切相关,因而对农户的签订合约的行为影响较大。

(3)农户禀赋特征对签约行为的影响。在农户禀赋特征解释变量中,人力资本禀赋变量中的“家庭非农就业人数所占比重”和“非农职业分布”对签订合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表明家庭非农化程度越高,家庭在转出农地时签订合约的可能性越低,其原因可能是家庭非农化程度越高,家庭对农地的依赖程度越低,对农地的关心程度也越低,因而选择签订合约的可能性也越低;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家庭成员从事非农的地点离村庄越远,其农地的转出可能大多委托他人转出,其签约的交易成本更高,因而签约的可能性也越小;另外,由于劳动力外出务工保障低,面临的风险大,非农家庭依然将土地作为其规避风险的退出保障,且非农风险具有不确定性,这意味着非农家庭签约的风险成本可能更高,因而农户不倾向于签订合约。

家庭平均非农工资对签订合约的影响系数为正,表明家庭平均非农工资越高,农户签订合约的可能性越大。一般情形下,家庭成员非农工资越高,表明其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法律意识可能更强,这样的

家庭在转出农地时会倾向于签订合同。

另外,社会资本禀赋变量中的“是否三代人生活在本村”在模型中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在村庄生活时间越长,农户越倾向于签订合同,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在村庄生活越久,对该村的乡土秩序了解越深,签约可能带来的风险成本易于了解和控制。变量“是否熟知村里权力大的人”在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农户流转农地时主要是家庭内部决策,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农户的法律意识普遍得到提高,对于土地流转交易更多地依赖于法律而非社会关系来解决问题。

(4)农地特征对签约行为的影响。在农地特征解释变量中,变量“转给生产大户农地数量”在模型中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农户在将农地转给生产大户时都倾向于签订合同,其可能的原因是,第一,生产大户的专业化生产经营活动风险更大,农户在转出农地时为了保护自身的权益而选择签订合同;第二,生产大户相对来说有更强的谈判能力,普通农户更愿意选择事前签约;第三,更重要的是,生产大户为了保证其稳定的预期,降低不确定性,更会倾向于签订合同。

变量“政府强制转出农地数量”在模型中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农户的农地是政府强制转出时都倾向于签订合同,其原因可能是政府强制转出时,农户排他能力弱,农户为了保护其权益而选择签订合同;另一方面,政府在强制农户转出农地时也会建议农户签订合同。

四、结论与启示

1. 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农户对农地排他权的认知与法律赋权的偏离度、农户的交易能力、农户的家庭平均非农工作、农户转给生产大户的农地数量及政府强制转出农地数量等5项对农户的签约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农就业占家庭人数的比重、非农职业的分布、农户对农地排他权的认知与社会认同的偏离度对农户的签约行为具有较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农户对农地排他权的认知、农户的交易能力、非农就业及农地流转的对象与方式都会对农户的签约行为产生影响。

2. 启示

为了促进农地流转的契约化和规范化及农民权

益的保护,应在政策导向上注意以下5个方面的问题。

(1)农地流转的契约化和规范化的首要任务是在法律上赋予农户稳定的地权,尤其是农户的排他权,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才有足够的预期通过契约来保护其权益。

(2)由于社会认同代表的是社会群体对法律赋予农民的土地权益的认可程度,尤其是干部群体对此的认知会影响到法律的强制执行是否与法律赋权相一致,从而对农户的权益产生影响。因此,农户的权益保护还依赖于社会群体,尤其是法律政策的执行者,对法律赋予农户的农地产权的正确认识和公正的对待农民享有的权益。由于农民的权益在法律上的界定不完整及农民自身行为能力的有限,农户拥有的部分农地产权被置于公共领域,社会其他群体,包括法律政策的执行者,都在参与对置于公共领域的土地权益的攫取,因此,应从法律上进一步界定农户对土地的产权,并对其他群体的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这有助于农户对参与农地流转形成稳定的预期,降低农地流转中存在的风险成本。

(3)农户对农地产权的行使能力会直接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意愿和程度及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农户有较强的排他能力,一般情形下可以有效地保护自身的权益。如果这种排他能力是法律赋予的,则可减少农户的排他成本,如果这种排他能力源自个人的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禀赋,其排他成本则可能高昂。农户交易能力的强化有利于农地流转的契约化和规范化。

(4)农户的认知直接影响其行为,但农户对土地相关法律与政策的了解和理解非常有限,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宣传与解释,帮助农户更好地理解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宣传与解释,帮助农户更好地理解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宣传与解释,帮助农户更好地理解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宣传与解释。

(5)农民的非农就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地的流转,但由于外出务工农民的社会保障程度低,土地对大部分的农民工来讲依然具有福利保障功能,作为其规避非农就业风险的方式之一,在一定的程度上阻碍了农地流转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有必要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来促进农地流转的契约化和规范化,进而保障务工农民的权益。

参 考 文 献

[1] 叶剑平,丰雷,蒋妍,等. 2008年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调查研

究——17 省份调查结果及政策建议[J]. 管理世界, 2010(1): 64-73.

[2] 祖彤, 杨丽艳. 法律视角下农村土地流转面临的困境与出路[J]. 特区经济, 2012(2): 192-194.

[3] 李小云, 左停, 李鹤. 中国农民权益保护状况分析——《农业法》第九章“农民权益保护”实施情况调查[J]. 中国农村观察, 2007(1): 53-61.

[4] 焦存朝. 基于主体视角的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的思考[J]. 农业经济, 2010(1): 51-53.

[5] 杨丽莎. 贵州省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分析[J]. 特区经济, 2011(6): 176-178.

[6] 阎武. 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护对策[J]. 学术前沿, 2011(9): 108-109.

[7] 王德应, 董玉芳. 农民土地产权保护若干问题探讨[J]. 农业经济问题, 2005(7): 49-52.

[8] 韩东林. 当前中国农民面临的四大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04(9): 33-36.

[9] 赵其卓, 唐忠. 农用土地流转现状与农户土地流转合约选择的实证研究——以四川省绵竹市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 2008(3): 13-19.

[10] [美]巴泽尔. 产权的经济分析[M]. 费方域, 段毅才,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7.

[11] 崔宝敏. 组织缺失、不完全市场与农地合约[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9(9): 57-63.

[12] 赵阳. 共有与私用——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经济学分析[M].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2007.

[13] 田传浩. 农地制度、农地租赁市场与农地配置效率[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14] 黎霆, 赵阳, 辛贤. 当前农地流转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10): 4-11.

[15] [美]汤姆·蒂坦伯格, 琳恩·刘易斯.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M]. 王晓霞,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Property Rights Cognition, Action Capacity and Contract
Signing Behavior of Farmland Transfer

——Based on Survey of 890 Household Farmers in China

LIU Yi-ming, LUO Bi-liang, ZHENG Yan-l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explore the impacts of farmer’s cog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of farmland, capacity of a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endowment and the features of transferred land on farmers’ behavior of signing a contract when farmers participated in the farmland transfer, using the Logistic model based on the survey of 890 rural households in China. The result shows that farmers’ cognition on exclusive rights of arable land, farmers’ transaction capacity, non-agricultural occupation, and the target and patterns of transaction will have impact on farmers’ signing contract behavior. Therefore,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as household’s land rights should be stabilized and defined legally, other social groups’ behaviors should be regulated and limited, national laws and policies should be propagandized and explained further to strengthen the farmers’ understanding and help them protect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finally social security of those farmers who moved to the city should be improved to promote contract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farmland transfer so as to ensure those migrant work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 words land system; farmland transfer; property rights cognition; action capacity; behavior of signing a contract

(责任编辑: 陈万红)